

文化的不可译性及转化策略

江敏, 董元兴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Jiang Min, Dong Yuanx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PRC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not only a conversion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but also a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culture leads to partial untranslatability. Based on the dispute between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this article explains in detail the connotation and root cause of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and proposes sever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to deal with 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ation activities.

Keywords: culture; untranslatability;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语言既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文化的载体, 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都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作为不同语言文字系统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活动, 翻译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但由于各民族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以及民族心理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在翻译过程中, 源语和目的语之间不同的语言文化因素使两种语言间出现意义缺失, 源语无法转化成对应的目的语, 这种现象被称为文化的不可译性。文化不可译性实际上隐含在翻译的任何一个环节中,^[1] 形式多样, 纷繁复杂。如何认识文化不可译以及在翻译活动中如何将文化不可译因素转化为目的语对等信息是本文要探究的主要问题。

可译与不可译

可译与不可译之争由来已久。文艺复兴时期, 但丁提出了“文学作品不可译”的观点, 他认为通过翻译, 原诗的许多特征, 如韵律和美感都会在译文中流失。^[2] 欧洲中世纪的翻译理论家阿蕾蒂诺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他认为, 有效的翻译在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是可能的。^[3] 这两

种观点近乎“绝对的不可译”或者“绝对的可译”。17世纪英国著名翻译家德莱顿则认为，绝对的直译是不可能的，可译性是有限度的。^[4]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语言是可译或者不可译的，语言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要充分考虑可译性限度。这一观点在20世纪西方翻译语言学派理论家中得到了极大的认同。雅科布逊、奈达、纽马克等都认为，一方面，语言之间是具备相通性的，这是翻译行为之所以发生的基础；另一方面，可译性又是有限度的，绝对等值的翻译是不存在的，翻译过程中出现信息缺失难以避免。卡特福特提出了翻译的等值论，他认为“可译性的确是一个连续体而不是一个明确的二分体。源语文本和单位或多或少是可译的，而不是绝对可译或不可译的”。^[5]奈达指出“在语言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等，因此也没有完全准确的翻译。译文的总体影响只会接近原文，不可能在具体内容上一致”。^[6]上述论述告诉我们：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不是二元的、截然对立、不可调和的矛盾体。不可译是客观存在的，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属性和不同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决定的。译者应客观对待可译性和不可译性这一对矛盾，充分利用各种翻译策略，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

文化不可译性的内涵及原因

首次正式提出“文化的不可译性”这一概念的是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特，他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将不可译性分为两类：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语言的不可译性主要发生在语言形式上，即目的语没有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比如源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或者源语一词多义在目的语中没有相对应的形式，如双关语。^[5]与之相对应的，文化不可译性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与源语文本功能相关的语境特征在目的语文化中不存在。^[5]翻译不仅是一种转码活动，更涉及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应。廖七一指出，当信息源与信息的最初接受者之间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鸿沟时，译者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无法做到译文和原文尽善尽美的对应。^[7]

1. 文化不可译性的原因

文化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活动产品，具体而言，人类文化内容指群族的传统习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文学艺术、规范律法、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文化具有民族性，因此不同民族所持有的文化必然存在局部的不可通约，从而使得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语言存在某些在其它语言中缺失或者无法表达的地方，也就是语言间的不可通约之处。在翻译过程中，这种文化不通约性就是不可译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为源语文化所独有的文化符号、概念意义在目标语中缺失或无法完全对应。一个民

族的某种文化可能在另一个民族里找不到相似或对应的文化；相同的文化习俗可能承载了不同的寓意；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淀下来的一些传统因素，比如历史典故等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不同民族与文化下宗教文化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文化不可译性的原因主要归纳为以下三点：

(1) 文化词汇空缺。源语中反映特有文化现象的词汇在目的语的词汇场中空缺，从而形成不可译。中国文化中有许多独有的概念，如：“状元、本命年、风水、面子、生肖”等，以及一些新词汇：“土豪、城管、佛系、中国大妈”等，在英语中都没有词汇与之对应。而英语中也有一些词汇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的词。另外一种特殊的文化词汇缺失源于文学作品。经典文学作品创作的经典人物，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质，往往会形成特殊的表达，成为该文化和语言中的特定文化词汇，如“祥林嫂、阿Q、孔乙己、林妹妹”等，都带有跟人物形象相关的特定含义，在翻译的时候直译名字显然不能实现等值表达。西方文学作品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如“夏洛克、李尔王、葛朗台”等。

(2) 历史典故独特性导致的不可译。历史典故具有群族独特性，故而源语的历史文化典故以及由其形成的习语通常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应的表达。在翻译的过程中若完全采用直译，译文读者必然会茫然不解；若完全采用意译，即只翻译其喻义，放弃其典故出处，在文化传播方面又会有所缺失。

(3) 宗教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可译。宗教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与文化难解难分。不同民族往往信奉不同的宗教，在文化中上呈现不同的形式，在语言中形成不同的表述。西方国家多信仰基督教，中国则以儒释道为主要信仰。儒家、道家、佛教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在汉语中，人们经常会用“得道”、“成仙”这样的字眼来象征“修成正果”，而在英语中则多倾向于用《圣经》中“salvation（救赎）”来形容灵魂的洗礼，这两者在意义上有相近之处，却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时，若对等起来而不加注解，就会使目的语读者感到困惑。汉语中“无为”、“难得糊涂”等词汇描述的是道家所推崇的人性返璞归真的一种哲学境界，如果按其字面意义翻译，则只能表达“没有某种作为或行动”，这类词汇具有高度的不可译性。

三. 应对文化不可译性的转化补偿策略

文化不可译性的根源在于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但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文化不可通约性也会随之减弱，甚至彼此吸收成为共同的文化，因此，文化的不可译性是相对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不同文化的交融和渗透日益显著，因此具有文化不可译特性的语言

可通过相应的翻译策略来缩小源语和译语之间的差异,以达到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的目的。^[8]译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寻求译本与源文本最大程度的对等,将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9]译者可以从归化和异化两个维度入手来补偿与转化文化的不可译性。

1. 异化关照下的音译或直译加注法

文化词汇空缺导致的不可译可通过音译或者直译加注法来化解。这种补偿性翻译方法,通过加注的方式对音译和直译提供词汇附着的文化信息,既顾及了原文,又弥补了目的语中的文化空缺现象。最近几年,汉语新词通过音译或直译加注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多地被英语国家所接受,比如中国大妈(Chinese Dama: bargain-hunting middle-aged Chinese women);土豪(Tuhao: nouveau riche);佛系(Buddhist-style: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至于早已进入英文词汇的jiaozi(饺子), fengshui(风水), kowtow(磕头),也经历了从音译加注到直接成为英文词汇的过程。

这种异化为主的翻译方法保留了文化差异,只要使用得当,不会影响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甚至一定程度的异国情调,可能会产生“陌生化”的效果,吸引译文读者,提高文化传播的效果。当然,过多使用音译或直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有可能造成对阅读的干扰,影响可读性,因此异化的使用要注意量和度,以不影响读者阅读愉悦感为原则。

2. 归化关照下的替换法

当具有文化不可译因素的源语在目的语中找不到对等语时,可用目的语中意义相近的固定表达法取代。这些近似概念译出的原文概念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已经被目的语使用者所接受。习语或成语往往蕴含典故,适合采用这种方法来翻译,即用目的语中引申意义相近的习语或成语替换源语的习语或成语。如:“a smart mouse has more than three holes”译为“狡兔三窟”,“like a duck in water”译为“如鱼得水”。要注意的是,替换法的使用范围有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不影响源语词汇所蕴涵的意象和色彩,二是源语和目的语对应的表达在功能和意义上基本相当,否则会引起对源语意义的曲解,影响交流和文化传播。

综上所述,文化不可译的处理宜采取转化的方式来实现等值翻译。当然,在翻译实践中,两种方法宜根据实际情况结合使用,最大限度地呈现源语文化内涵,同时保证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

四、结语

随着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文化视角已经成为翻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由于各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翻译中存在巨大的文化鸿沟。文化词汇空缺、历史典故差异、宗教文化差异都为翻译活动带来了阻碍。这种阻碍虽然会影响到翻译的等值,但并非无法克服。文化的不可译性

不意味着译者“无能为力”，更不意味着译者可以“不作为”，译者的任务就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可译性。因此译者要深入掌握本族语与译入语的文化，实现源语和目的语最大程度上的对等。反过来，等值有效的翻译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渗透，减少不同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从而减少文化不可译。二十一世纪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乃至思维方式的差异逐渐缩小，整个世界文化更加趋向普同，这也为文化不可译的转化提供了有利的背景条件和可接受度。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Routledge, 2002.
- [2] Robinson, D.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to Nietzsch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 [3]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Li Wenge. *Xifang Fanyi Lilun Liupai Yanjiu* [M].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4.]
- [4] Lefevere, A. *Translation / History / Culture: A Sourcebook*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5] Catford, J. C.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6] Nida, E.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7] 廖七一.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Liao Qiyi. *Dangdai Xifang Fanyi Lilun Tansuo*[M]. Nanjing: Yi Lin Chubanshe, 2002.]
- [8] 孙艺风. 文化翻译的困惑与挑战[J]. 中国翻译, 2016 (3). [Sun Yifeng. *Wenhua Fanyi De Kunhuo Yu Tiaozhan*[J]. *Zhongguo Fanyi*, 2016 (3).]
- [9] 董召锋. 从文化差异视角看汉英翻译中的不可译性[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2). [Dong Shaofeng. *Zong Wenhuchayi Shijiao Kan Hanying Fanyi*[J]. *Zhongdi Bukeyixing Chongqing Keji Xue Xuebao (Shehuikexue Ban)*, 2016(12).]